

○ 报刊公司　张嘉怡

2025 年深秋，我接到一项任务：前往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，采写中国工商银行青海分行在江多村的定点帮扶故事。作为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报刊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编辑，我日常都与堆积如山的稿件相伴，早已习惯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深耕细作。而这一次，我要走出办公室，以记者的身份奔赴海拔 4300 米的江多村——这个藏语意为“黄河源头”的村落，去触碰那些文字背后最鲜活的真实。

从纸页到高原，一场初心的奔赴

去玛多县的路，是从喧嚣到寂静的漫长跋涉。我乘坐高铁到达西宁，再转乘汽车向西南进发，公路渐次蜿蜒，城市被远远抛在身后，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苍茫草原。天空蓝得纯粹，云朵低得仿佛伸手可及，可随着海拔不断攀升，缺氧带来的头痛、胸闷等症状悄然袭来。

我紧抱着装满采访提纲和背景资料的笔记本电脑，指尖划过纸上“九年帮扶”“生态保护”“产业重生”这些关键词，心里满是忐忑：纸上的文字终究单薄，我能真正走进江多村的故事吗？能听懂牧民们沉默的心声吗？能在这片“生命禁区”里捕捉到最动人的细节吗？

同事发来微信调侃：“跑那么远采访，回来还不是要熬夜编稿，图啥？”我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牦牛群和五彩经幡，回复道：“图一份真实。纸上的故事是静态的，而我想看看那些数据背后，真实的人是如何生活、如何奋斗的。”

出发前，我反复研读工行青海分行的帮扶材料，江多村的困境与转机在文字中逐渐清晰。这里地处三江源核心区，生态保护红线制约产业发展，牧民惜售观念根深蒂固，工行人在九年的坚守中一步步走出了“有资源无产业、有产品无市场”的困境。这次远行，不是为了完成一篇简单的报道，而是为了通过媒体人的视角，丈量一片土地的变迁，记录一方人的坚守。

风雪初遇，读懂坚守的重量

抵达玛多县时，阳光穿过稀薄的云层洒下来，工行驻村第一书记马登盛早已等候在路边。他开着一辆旧皮卡车，皮肤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，眼角刻着细密的皱纹，笑容格外朴实。“路上辛苦了，这边海拔高，慢点走。”他说着，熟练地接过我的行李，跟等在旁边的工作队成员用流利的藏语交谈，转头又用带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解释路况。

车子在牧道上缓慢行驶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窗外，已经泛黄的草原上零星散布着黑色的帐篷，几头牦牛低着头寻找草料，远处的巴颜喀拉山在云层中若隐若现，透着原始而苍凉的壮美。“这里的美是拿艰苦换的。”马登盛一边小心驾驶，一边说起帮扶的开端，“2017 年刚定点帮扶时，牧民们连汉语都听不太懂，更别说相信银行能帮他们搞产业了。”

当晚，我住进了江多村唯一的招待宾馆。房间里的供氧机嗡嗡运转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头痛欲裂。窗外，风呼啸了一整夜，像是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严酷。我裹紧被子，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马登盛的话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“坚守”二字的千钧重量。这些工行人，远离家乡和亲人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一待就是九年，他们的坚持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个疑问，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渐渐有了答案。

酥油茶旁，聆听心底的真心话

采访的序幕，在一杯滚烫的酥油茶中缓缓拉开。

走进牧民索南才让的帐篷时，炉火正旺，酥油茶的浓香混合着牛粪的烟火气，驱散了满身的寒气。老人盘腿坐在地毯上，手里捻着一串陈旧的念珠，面色平静得像高原的湖泊。通过马登盛的翻译，我慢慢走进了索南才让的故事。“刚开始，听说银行要来帮我们搞产业，我心里想，你们懂放牛羊吗？”索南才让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“在我们这里，牛羊就是命，交出牛羊，就像交出了自己的命运。”这句话，刺破了我对帮扶的刻板认知——所谓帮扶，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，而是要先跨越观念的鸿沟，真正走进对方的内心。

马登盛坐在一旁，补充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：“早期我们驻村队员，靠着‘半吊子藏语+手势’沟通，跑断了腿也难走进牧民心里。后来，我靠着藏族身份，用藏语跟他们拉家常，时常在炉火边跟他们聊到深夜，才慢慢摸清了他们的顾虑。2020 年雪灾，合作社的牛羊冻死了一大批，老扎西蹲在雪地里抱着死羊羔哭，泪水在脸上结成冰，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们连夜联系分行协调物资，2022 年地震后又开通绿色通道，5000 万元抗震贷款 24 小时就到位了，56 小时后棉被、燃煤也送到了安置点。”

材料上冰冷的文字，在帐篷的炉火旁，变成了滚烫的回忆。格日措老人拉着我的手，她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，却格外温暖：“马书记带我去西宁看病，开了 500 公里的车，又在医院守了我三天三夜。工行的人，不是外人，是亲人。”在合作社的冷库前，63 岁的扎西伸手摸着冰凉的外墙，笑得像个孩子：“以前分割好的肉得租县城的冷库来保存，来回折腾还怕坏。现在有了自己的冷库，肉能存到冬天，工行给我们吃了定心丸！”

这一刻，我突然读懂了“金融活水”的真正含义。它不是账面上的数字，不是冰冷的贷款合同，而是雪灾中送来的温暖，是地震后撑起的希望，是牧民手中沉甸甸的收入，是酥油茶里泡着的真心话。

巴颜喀拉，感悟在场与责任

离开江多村的前一天，马登盛带我登上了巴颜喀拉山垭口。狂风呼啸，经幡猎猎，在云层下，星宿海泛着微光，像撒在草原上的星星。山脚下，印着“中国工商银行”标识的冷链车正驶过新修的公路，朝着牧民帐篷的方向驶去。马登盛告诉我，他已经递交了留任申请。他的母亲已 90 岁高龄，每次打电话都盼着他回家，可他总放心不下这里：“合作社刚起步，新队员还需要带，江多村的牧民也是我的亲人。”

站在海拔 4300 米的垭口，寒风刺骨，我的内心却无比滚烫。我早已习惯了在纸页上阅读故事，却常常忽略了故事背后真实的土地、真实的人、真实的情感。而这次亲身体验，让我重新理解了自己的职业价值。工行人用九年坚守，在生命禁区里种下希望的种子；牧民们用信任与勇气，告别了贫困的过去；而我们媒体人，就应该用笔和纸，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记录下来，把这份坚守与希望传递出去。

真实，是江多村冻土上艰难生长的草芽，是牧民手中颤抖的分红现金，是孩子眼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，是驻村干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。而媒体人的责任，就是跨越山海，去触摸这份真实，去传递这份温度，让那些值得被看见的故事，不至于湮没在岁月里。

归程落笔，让真实直抵人心

回到西安的办公室，我打开电脑整理采访素材。照片里牧民的笑容、录音里酥油茶的沸腾声、笔记里那些带着温度的细节，与窗外的城市喧嚣交织在一起，让我久久无法平静。我没有急于动笔，而是把自己重新带回那片草原，带回那顶帐篷，带回那个风雪交加的垭口。

我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，推敲每一句话语。因为我深知，这些文字承载的不仅是江多村的变迁，还是一群人的坚守、一份真实的温暖。我希望读者翻开这些文字时，能感受到巴颜喀拉山的风雪，能闻到酥油茶的浓香，能触摸到牧民手中的温度，能读懂那份跨越九年的深情。

这次玛多之行，于我而言，不仅是一次工作任务，还是一场职业生涯的洗礼。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——传递文化，播撒知识。这份工作的根基，正是真实——真实的故事、真实的情感、真实的力量。

工行人与牧民们，用九年时间在三江源的土地上书写了动人的帮扶篇章；而我们媒体人，也将以自己的方式，坚守文化使命，记录时代变迁，让那些扎根大地的真实故事，通过笔与纸，抵达更远的地方，温暖更多的人。我始终相信，好的作品，永远源于真实的土地、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情感。而作为媒体人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永远保持奔赴真实的勇气，永远怀揣记录时代的虔诚，以文字为舟，载着那些鲜活的故事，一路前行。

时 评

时代呼唤文学的共情力

○ 孙文振

当今社会，共情正在变少。2025 年《分子精神病学》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，社会经济地位与可测量的脑结构差异有关。哈佛医学院神经心理学研修员伊丽莎白·马蒂尔指出，当一个人几乎不必承担社会后果时，大脑就会减少对细微社交线索的关注。组织心理学家肖娜·沃特斯更直白：“共情最先消退，而且消退得很快。”她的团队追踪 1600 多名员工发现，高管和一线员工身处同一组织，却可能体验截然不同的现实，“权力会过滤信号”。

共情在公共话语里被排挤，在日常里被消磨，在权力结构和神经机制上悄然消退。可人心里那点东西退不掉。那些说不出口的话、没人接的情绪，总得有个地方放一放。文学便在这个时候悄然而至。

文学是众生平等的。它不看你坐在哪把椅子上，不看你名片上印什么。你翻开一本书，坐下来，你就是一个人，一个和作者和书里那个人平起平坐的人。现实里，共情常被地位、权力、效率过滤；可文学不肯过滤。它把被过滤掉的东西捡回来，把细微的、易被忽略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留下来，让你看见一个完整的人。那一瞬间，心里的某个阀门松了。你无处安放的心情找到了安放，无人可说的心事找到了倾听。

但有个前提：能安放心情、能与人共情的，必须是好的文学。共情会退化。权力过滤信号，效率过滤信号，套路也过滤信号。这话对写作者同样成立。一个写作者若长期只跟同一种声音打交道，只在小圈子里打转转，只按现成套路去写，他的共情能力也会退化。他不再费力气观察真实的人，只依赖预设的人物模板。写出来看着像那么回事，可里面没有人。他以为在共情，其实只是在重复固有表达。写作者丢了共情更麻烦，因为他手里有笔，写出来的东西会被很多人读到。他写的是假的，读者收到的也是假的；他写的是窄的，读者看到的也是窄的。

好的文学拒绝感知惰性。它有一整套评价体系：文学性是底子，思想性是骨头，艺术性是血肉，思辨性是呼吸。四样缺一样就难站稳。可更根本的是，文字背后有没有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。那个写作者是不是真的看见笔下的人，是不是真的把心打开过。没有这个“人”，四性就可能变成技术表演，看着漂亮，读着顺溜，却跟你隔着一层。

按这个标准看，有些文字只是“复述性”记叙文：把一件事从头讲到尾，把一个人从外写到里，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可就是进不了文学的门。复述是信息搬运，文学是感受传达。复述追求“说清楚了一件事”，文学追求“让一个人被看见”。更值得警惕的是模板化写作：把现成场景、现成情绪、现成句式拼在一起，表面挑不出毛病，可读完心里什么也没留下。它不是在写一个人，而是在拼一个人；不是在安放心情，而是在表演心情。共情最怕这种悬空虚浮、割裂断裂的东西。

这种弊病在报纸副刊这类直面大众的文学园地中尤其值得警惕。副刊版面有限，恰恰因此最考验编者和作者眼光：你选什么、写什么、把什么气息放进这块园地，直接决定它能接住多少读者。共情不能只窄化为一种气息。生活是多声部的，情感是多层次的。气息越多、越丰富，共情才越厚、越广、越能接住人。只写一种气息，共情就薄，就窄。好的文学，是肯把多种气息都写出来的文学。气息丰富，共情自然厚重。浅薄的共情接不住人；厚重的共情，才安顿得了人。

但文学里的共情，不划阵营，不设前提，不用对抗证明存在。它只是安安静静把一个人放在你面前，然后相信你能看见。这份相信本身就是尊重，这份尊重本身就是安放。

文学的共情需要被更加重视。社会还需要共情，而共情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，得有人去写，有人去编，有人去读。尤其在今天，AI 越来越强大，能写诗，能编故事，能模仿各种腔调，可以搭建逼真的文字外壳，却无法生成源于真实生命体验的难处、柔软与坚韧。越是这样，越需要有人先醒着。副刊编辑醒着，才能把真正有共情力的文字挑出来；写作者醒着，才能不追着套路跑，肯花力气写一个真实的人；读者醒着，才能在满屏喧嚣里还愿意停下来，翻开一页书，安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

说到底，好的文学更像一扇窗。它照见：让你看见一个完整的人，也让你被看见。它联结：在你和另一个人之间搭一根线，让你知道你不孤单。它安顿：接住你无处安放的情绪，让你把心放下。照见、联结、安顿，这三样在当下，几乎从别处找不到。文学可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你读完一本书，生活还是那个生活，难处还是那个难处，可你心里多了点什么，那点东西说不清道不明，却让你第二天真正面对事情时，觉得日子好像轻了那么一点点。那一点，可能就是文学给你的力量和智慧。

让唐诗从典籍走进烟火

“何以中国·诗词里的千年文脉”网络主题宣传活动 11 月 19 日在西安启动。技术日新月异，诗词依然是中国人面对家国、命运时的精神密码。而西安正以一场系统性的城市文化工程，尝试回答一个更具时代感的问题：千年诗脉如何在今天“活”起来？

2025 年 9 月，西安发布《打造唐诗文化品牌实施方案》，明确提出用三年时间，到 2027 年底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“唐诗之都”。这不是零散的文旅营销，而是一项涵盖理论研究、遗产保护、文商旅融合、品牌塑造、数字创意五大工程 26 项具体任务的系统性布局。锚定“诗道终南，心意长安”的核心 IP，西安正试图让唐诗从课本里的背诵任务，变成可看、可听、可游、可参与的城市日常。

行走今日西安，诗意的确正在渗入街巷肌理。曲江飞行剧院以球幕投影让观众“飞越”盛唐坊市，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用裸眼 3D 让诗句投影于餐桌之上，大唐不夜城的“李白”与游客对诗互动——游人不再是旁观者，而是走入诗境的同行者。集章寻诗、AI 定制藏头诗、唐诗主题咖啡等轻量玩法，降低了经典的接受门槛，形成打卡、分享、复游的良性循环。中秋诗会、七夕雅集、花朝节活动借节日契机唤起大众的诗意共鸣。科技与商业并非文脉传承的对立面，用好这些载体，能让年轻人愿意主动靠近、乐于二次传播。

文脉的延续，根基在少年。西安市以课堂教学、校本课程、主题活动、环境浸润、跨学科融合“五位一体”的方式推进唐诗进校园，依托杜公祠、乐游原等遗迹打造实景研学课堂，让诗词故事、传统礼仪、古典美学走进鲜活场景。当少年人在互动中读懂诗句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山水理想，诗词便不再是应试任务，而成为能够滋养一生的精神养分。

从大雁塔下的唐风遗存，到古城街巷的诗意场景，文脉传承最好的方式，就是让经典走进烟火，让烟火中的人真正与经典相遇。当诗词不再是需要正襟危坐研读的古籍，而是流淌在城市日常里的风景，同时又能让人在某个瞬间被一句诗击中、被一种情怀打动——千年文脉便真正完成了从典籍到心灵、从流量到生命的传递。这或许才是今天重读经典、追寻“何以中国”的深层意义。

来源：人民网
作者：庄红韬